

词学研究丛书

严迪昌著
齐鲁书社

陽羨詞派研究

杜A題



词学研究丛书
阳羨词派研究

严迪昌著
714605

齐 鲁 书 社

I207.23
Y167

鲁新登字07号

714605

词学研究丛书

阳羨词派研究

严迪昌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77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294—X

I·106 定价：4.60元

序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词学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而词学研究中的词派研究，又是更薄弱的。因此，一说到词派，人们往往只知道婉约派、豪放派。其实这不过是沿袭明朝人的一种说法而已，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两个词的流派。至于说到清代的词派，人们往往也只知道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浙西词派毕竟风靡了清代词坛一百余年，而常州词派的影响，则至今还清楚可见。但是，对于柳洲词派、阳羨词派、吴中词派、临桂词派等，知之者就很少了。甚至对清初词坛影响极大的阳羨词派，连《词史》和《清词概论》之类的专书也未提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这可能是受“正宗”、“别格”传统观念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限于当时研究水平的缘故。这对了解清词的发展，了解这些词派的宗旨、盛衰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很不利的。有鉴于此，十年前我们在酝酿词学研究丛书选题时，就把词派研究列为大项之一。1983年在上海第一次全国词学讨论会上，当时正从事《全清词》编纂工作的严迪昌先生提交的论文《论阳羨词派》，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他认为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羨词派是清初极为重要的一个词派，它的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影响不小，过去不为词学研究者注意，是不应该的。可以说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我们就商请他承担《阳

《阳羨词派研究》这一选题，蒙他慨然接受了邀请。经过迪昌先生好几年的努力，现在这本研究阳羨词派的专著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研究词派的第一本专著，是开创性的。我相信，词学界的朋友们和广大读者都会欢迎的。

有人说：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些，但这对于了解“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南北的杜甫这样一个伟大诗人的诗，确是颇有道理的。其实不仅是研究杜诗的人应该如此，我们研究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流派也应该如此，特别是尽可能地作一些实地考察、访问，这无疑会加深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我知道迪昌先生为写这本专著，除了跑图书馆收集资料、勤于爬梳之外，就曾先后数次跋涉于太湖西岸的溪山之间，对阳羨（今江苏宜兴）的山川、历史、人文，对陈维崧及阳羨词人的遗迹及影响等作深入的实地考察。正因此，使他这本专著更丰富、充实、有新见，这是本书的特点，也是迪昌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阳羨词派研究》不但内容丰富、充实、有新见，而且剖析也很精细，其中某些观点和思想，我认为不仅对了解阳羨词派有助，就是对当今学术研究以及诗歌创作，也不无启发，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写史、作诗，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这是大家公认的。其实写任何著作，才、学、识又何尝可以缺一呢？拿学术著作来说，学、识当然是重要的，但文艺的功力也不能缺少。以此来衡量迪昌先生这本专著，可以说是学、识、文并臻。因此我为读到它而由衷地高兴。我真诚地希望迪昌先生继续对其他词派作研究，继续写出像《阳羨词派研究》这样的佳著，更进而写出词派史，对祖国的词学研究不断作出新贡献。

我由于工作和爱好，涉足词学研究领域，但自知所知不多，所识甚浅。迪昌先生书成，命我写序，屡辞不获，谨以芜辞，聊报雅命。

马兴荣

1990年5月于上海忆邛庐斋

HA 12/07

作者简介

严迪昌 1936年生。

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清词史》、《金元明清词选》、《文学风格漫说》等。

目 录

序	马兴荣	(1)
引 论		(1)
第一章 阳羨人文历史概述		(10)
第二章 阳羨词派的时代背景及其词风的历史渊源		(21)
第一节 阳羨词派的时代背景		(21)
一 鼎革之初阳羨社会态势		(21)
二 顺治年间阳羨案狱情状		(28)
第二节 阳羨词风的历史渊源		(40)
一 苏轼“楚颂”神思的孕化		(41)
二 蒋捷“竹山”情韵的脉承		(50)
第三章 阳羨词派的形成及其兴衰过程		(56)
第一节 清初词坛简述		(56)
第二节 阳羨词派的形成及其兴衰		(64)
第三节 阳羨、浙西时序辨		(85)
第四章 阳羨词派的词学观及其理论建树		(92)
第一节 力尊词“意”的本体功能论		(93)
第二节 独崇真情的风格兼容论		(104)
第三节 情韵兼求的声律观		(110)
第五章 阳羨词派创作成就总论		(114)
第一节 抒民生之苦哀		(115)

第二节	悼家国之沦丧	(124)
第三节	乡情绵邈的风土民俗词	(137)
第四节	忧生伤逝的亲情友情词	(145)
第六章	阳羨词宗陈维崧论	(158)
第一节	陈维崧生平行迹考辨	(158)
一	“如皋八年”避祸考	(160)
二	“京华四载”出仕辨	(164)
第二节	陈维崧词的艺术风格	(176)
一	迦陵词风演变的历程	(178)
第三节	稼轩、迦陵词风异同辨	(195)
第七章	阳羨词人群传论	(205)
第一节	任绳隗·徐喈凤附徐翔凤·史惟圆	(206)
第二节	陈氏群从：陈维崧·陈维岳·陈维岱·陈 枋·陈履端	(214)
第三节	万树·曹亮武附吴白涵	(220)
第四节	蒋景祁·董儒龙	(227)
第五节	阳羨词僧：弘伦·原诘·随时·超正	(234)
结 语	(246)
后 记	(248)

引 论

流派群体的研究理应是文学史或文体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项前期工程。因为，作为风格的群体性选择形态的文学流派的起落更替，按其实质而言，乃是在对某一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价值观以及审美意义的共识上发生了裂变的涌动现象。所以，它们的兴衰变迁每每是或一时代文学风貌衍化演进的征兆乃至标志，这在唐宋以来的发展史程中尤见显然。由此，要得以全面准确地展现历代文学的流变景观，就绝不可轻忽对各历史时期的各个文学流派的辨认和研讨，务须梳理清楚诸种流派的构建脉络和演化轨迹。而在词的流变史的研究中似更为有此必要。

继元明两代词的风气日趋委靡之后，一代清词以其流派纷争、风格竞出的盛况，振颓起衰，为词的通史谱就出璀璨丰硕的殿末之卷。清词艳称“中兴”之说，论者羌无异议，久为词学界所认同。

可是，历经七八百年的演进，在格律声韵以至章句体式等各个方面均已严格地定型的词这一抒情诗体，何以在走成马鞍型起落行程际，到了清代却又衰而复盛、蔚为大观的呢？这原是文学发展史抑或文体流变史上颇为罕见的奇异现象，亟待人们深入予以探讨的。然而由于对清词复盛的具体时期的界限，近百年来词界学者认识颇多殊异，故“中兴”之说仍多浮泛。

与此密切关联并障碍着对史实的具体探溯的则是于清词流派的认定上，严重地存在有传习的偏见。关于前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概述为“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其旨于乾、嘉以还也”。若刘毓盘的《词史》则以“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之章来上承“论明人词之不振”。是为对清词“中兴”于何时的较有代表性的歧异，至于认定晚清词始“中兴”的论家尤不乏见。关于后者，其实昔年谭献在《篋中词》的评述中已说到：“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尽管谭氏仍衍袭旧说，前朱彝尊（锡鬯）后陈维崧（其年），即先“浙西”、后“阳羨”，然而“本朝词派始成”六字，意甚明确。但清词之有“阳羨”一派的史实，近世并未获得确认。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第二章《派别》中就只称：“有清一代之词有二大别，一浙派，一常州派。亦犹散文体之有桐城、阳湖二派也”。清词研究原处于筚路蓝缕阶段，故因循陈说现象每难驱去，而徐珂之说复具其所谓权威性，以至有论者径谓“阳羨无派”云云。

诸如此类的问题欲求澄清，既得依赖于史料的发掘整理，史实的稽考勾沉，又需借助于通变的切合实际的史学观。

此际有二个概念必须获得共识，不应有随意性或偏执性的解释及发挥。一是“中兴”，二是“流派”。

何谓“中兴”？简言之，“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式化的旧观恢复，不是循沿原有的轨迹或渠道复古回归，同时，“中兴”又不是“集大成”的同义语。“中兴”是振新，是发展，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一次演进，一次流变。流变本是一切事物得以新生得以兴隆的活力所自，反之一味因循沿袭只能导致

衰竭凝滞，从而也必然失却其持续传统、继承前贤的积极意义。所以，词的“中兴”实乃是重新获得生气活力充溢其文体外壳的一次振兴。

两宋以来词的发展史实表明，当词日渐与音乐相游离而独立成为抒情诗体之一种时，也就是说，当其已从声乐音律的附丽之体上脱颖而出，审美感官也由以听觉为主转向以视觉接受为主后，词的本体功能亦随之从浅斟低唱型的聊供清娱的“艳科”、“小道”的隘狭之谷中逐渐获得了发展。尽管正统的甚或保守的词论家蹙眉不以为然，但“诗庄词媚”之类的畦畛毕竟宣告突破，模式已非单一。而可庄可媚，亦庄亦媚，恰好表现为词的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于是词的生命力也获得了一次次沛然的补益。这正应是研讨和梳理两宋以后词的发展史实的重要的透视点。需要说明的是“可庄可媚”或“亦庄亦媚”的“庄”和“媚”，既同属认识意义又同为审美意义的指称词，彼此不存在价值意义上的轩輊之别。元明两代词的衰颓事实的恰恰并非由于太“庄”或太“媚”，其致命处乃既失却了丰富的认识价值，又缺乏其足够的陶冶情趣的审美价值，正足以佐证上述功能之说。

辨认和论定清词“中兴”问题，自也唯有依此认识为准绳，不然如简单着眼于是否步武两宋某某大家，宗法某某风格，那绝非“中兴”而仅是复古。古代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的推源溯流，亦仅只是推溯源流而已，不能以之为沿袭模拟作护法。至若胶着于“字字协律”与否，则更易趋入歧途，甚而陷于“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郭麐《灵芬馆杂著·梅边笛谱序》）的泥淖。倘推举此类弊病最为严重的“后吴中七子”的戈载等为“中兴”功臣，显然是偏颇之

见。

所以，清词之得以“中兴”，只可能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其充分发挥；清词称“中兴”，乃指词重又获有生气活力，足证仍卓具价值的一次新繁荣。基于此，陈廷焯作为词史研究专家返顾观照词的发展流程，说“再振于我国初”，毋论其具体观念如何，就整体言是符合史实的。因而，我又完全认同诸如《一氓题跋·清康熙本瑶华集》跋文中的论断：“论清词而不崇顺康，则有清一代为无词。”

清词的振兴，论其业绩应首先归功于名家辈出的清初词坛。这是一个需要从宽阔的时空背景上展开充分探讨的命题，而对阳羨词派进行公允的重新认识，则是该命题应有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对“中兴”问题的思考，推动着笔者对真正堪称清代第一个词的流派的关注。

这样，就需要探究何谓“流派”的问题。

流派是运动着的实体，其形态可能是松散的或是紧密的。但一个文学流派的构成并为人们所认同，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和因素：（一）要有一面足资号召或卓具权威性的旗帜，也即需要有一个盛名四扬、成就卓绝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领袖人物为宗主；（二）在这领袖人物周围聚合起一个创作实践异常活跃，颇著影响的人数可观的作家群落；（三）这个作家群落尽管各自有一己独擅的艺术风采和个性特点，但从群体形态上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共同追求的审美倾向；（四）群体性的艺术观念或大体相近的审美主张，集中体现于类似流派宣言式的选本或作品总集中。

诚然，文学流派自身有一个渐趋成熟的发展史程。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及诸种文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品，是伴随着文

学文体的演进而萌生的，由雏型到准流派形态，而后渐至成型。所以，不同的历史阶段，流派现象殊有差异，不能划一以规矩，机械地定方圆。如上述之（二），群落的构成机制就先后有差别，唐宋以前流派成员更多地呈纵向的历时性形态，而唐宋以后则大抵为横向的共时性形态。特别是明清时期，地域性、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尤见加重，包括宗亲、姻亲等组构而成的这种网络，是对单纯的师承渊源的补充，进而隔代私淑或心仪瓣香的纵向时空延续现象，更多地为横向为主、纵横交错的扇形群落实体所取代。言明清二代的文学流派务必不能轻忽这一特征。至若（三）（四）两个特点同样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各有差异，前期较多或以题材成派，如边塞、田园、山水；或以仕宦僚属及政见共识结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而后期则文学本体功能或文体审美意识的自觉性增强，既不只限于或一题材的归属，又不直接地或较多地从属政治性集团为附丽。由此而言，宋代的江西诗派应是文学流派实体成熟之始，而明清之际则已发达至烂漫程度。

如果以上所述大体切合事实，那么，据之以考查清初词坛，今江苏宜兴旧称阳羨之邑确凿地有一词的派别存在。这个词派在上述各个方面几乎无不具备着成熟而鲜明的标志，甚至可以说，于清初以至整个清代如阳羨词派那样完备而自觉地呈现流派所应有的特点的正也不多见。

是的，这是一个不仅事实上客观存在着，而且早在当时即已被同道所承认的影响巨大的词的流派。

作为一派领袖的陈维崧，其在词创作实践中所强烈呈现的创辟意识，以及“入神超圣，继往开来”的实际成就，在康熙之初即已得到公认。他的《湖海楼词》所兼具的“儿女情深，

风云气在”的神韵奇采，无论在其生前抑或身后，也无论是其同道还是后辈，全皆为之折服。“屈指词人，咄咄唯髯，跋扈飞扬”，“海内真才能有几”的评断是一致的。而聂先于《百家词钞·荫绿轩词》后所下的十字判语：“荆溪其年昆仲，独倡声教。”则是众多推誉其开派地位的赞评中的一个简切的论定。

当我们从今尚存见的文献略予考查，又能发现，在陈维崧与常州词人邹祗谟、董以宁等一起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刻烛倡和之际，阳羨词风尚未脱“云间”一脉的沿袭，待到康熙初期，“湖海楼词”始率先变更风貌。如果由此推算起，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万树病逝于逆旅江舟中，再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蒋景祁去世为止，那末，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羨词派形成到盛衰过程仅只有三十多年时间。可是就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时空里，区区阳羨一邑团聚在陈髯左右的词人竟达百人之多，这可由《瑶华集》、《荆溪词初集》为证。在词的发展史或流派史上，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典型的值得重视的现象。

在这近百家词人中，除去陈维崧外，于当时斐声词苑而迄今仍能觅见传世之集的也还有二三十家之多。其中如史惟圆的《蝶梦词》、任绳隗的《直木斋词选》、徐嗜凤的《荫绿轩词》、曹亮武的《南耕词》、万树的《香胆词选》、蒋景祁的《鬲画溪词》、董儒龙的《柳堂词》，以及徐璠的《双溪泛月词》、徐玘的《湖山词》、路传经的《旷观楼词》等，都属饮誉一时的名家之作。而陈维崧兄弟中如陈维崧的《亦山草堂词》、陈维岳的《红盐词》、陈维岱的《石间词》，子侄辈中陈枋的《香草亭词》、陈履端的《曩余词》，亦均卓然成家。

其中迦陵三弟陈维岳和从侄陈枋的创作成就尤著，惜乎大部已散佚。此外尚有宜兴词僧弘伦的《泥絮词》、原诘的《红豆词》等以至于流寓或入籍阳羨的史可程的《观槿词》、史鉴宗的《青堂词》、龚胜玉的《仿橘词》等等为羽翼，真是蔚然大观。

于一时一地拥有如此壮大阵容的词人群落，实不多见。当时或略早可以相与媲美的似止有也属向未被研究家注意到的浙江嘉兴地区的“柳洲词派”。但柳洲词群在时间跨度上既大于阳羨，风格也仍多“云间”遗痕，成就和影响均远不及之。至若后起的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不仅在流派构成的背景上已与阳羨迥异，即以群体的创作实践及对词学振兴的贡献而言，亦甚难与阳羨一派作等量之观。

又，阳羨词群在康熙二十五年前至少编选有四种词的总集和选本，即今犹存世的：陈维崧主编的《今词苑》（又名《今词选》），由陈维崧倡议、曹亮武、潘眉等编录的《荆溪词初集》，蒋景祁独自编纂的《瑶华集》及《名媛词选》。前三种均系规模宏大的汇选本，赖以保存了大量清初人词作，是与邹祗谟、王士禛合编的《倚声初集》、佟世南编的《东白堂词选》、陆进等编的《西陵词选》等一样，为研究清词流变史极为珍贵的文献。此外，陈维崧早期编就的《妇人集》也是与词颇多关系的史料汇总，而据曹亮武《南耕词》可知，陈维崧也编录过一部《古今词选》，惜未及刊刻而早已亡逸。

选本和总集的编纂，其意义还在于其中集注着阳羨词群的关于词的本体功能观、价值观以及审美倾向的论述。陈维崧等提出的词的“存经存史”、“亦经亦史”的理论主张，不仅在清代词学史上，而且是词的全部历史上第一次以最明确、最有

系统的表述方式阐明着现实主义的词学观。阳羨词派的关于“意”的论述主张，既早于常州词派约一百五十年，而且就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言，前者显然更具积极意义。

至于早在康熙七年（1668）就与陈维崧一起“论其志”，而后终于完成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万树编著的《词律》，更是清代早期最称卓著的一部律谱。《词律》的对明人词律图谱之讹错的校订指谬，从而对清词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无须赘述而众所周知的。

粗略地开列上述清单，尽管尚不足以说明一个词派的应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但“阳羨有派”已甚显然明确。而从本书后面逐章展开的论述中更可清楚看到这不仅是一个有宗师、有群体、有理论主张的词派，而且还是一个从共同追求的艺术倾向中体现出着一代文人特殊心态的流派群落，烙铸有鲜亮的特定时代的精神印记，从各个层次和角度形象地表现着特定历史的面貌。

所以，可以无须矫饰地说：

这是一个崛起于沧桑剧变、风云诡谲的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

这是一个以悲慨激扬和萧瑟凄清的多侧面的情韵，浓重地表现了旧巢倾败、新枝难栖的复杂凄苦心态的词的流派，

这是一个关系到清初词风嬗变，以至一代清词所以得而生气张扬、衰而复盛的贡献至多的词派，

这是一个词史上罕见的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谢章铤语），真正推尊词的体格的词学流派。

因而，论清词而只知有浙西、常州两大派，而无视阳羨一派的雄风别具，无疑是乖悖着清词发展的流变史实。